



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愛滋政略—序

黃道明

在世界邁入愛滋半甲子之際，愛滋地景也在這新自由主義掛帥的年代裡有了新的變遷。在抗愛滋病毒療法（雞尾酒療法）的干預下，愛滋病的死亡率大幅降低。雖然抗愛滋病毒藥物無法根除愛滋病毒，但它有效壓制了病毒量在感染者體內的繁衍速度，讓愛滋病成為一種如糖尿病般可以經藥物控制的慢性疾病。然而，儘管醫藥干預下的愛滋病毒有了質變，更可透過不同防護措施來大幅減低感染風險，但是台灣社會、乃至於政府，對感染者的成見卻依然停留在 80 年代初期的「愛死病」想像：不但民間將之視為「自作孽」，政府更視其為危害國民健康、崩壞社會秩序的頭號公敵。儘管愛滋病毒的傳染性低，但愛滋病到現在還是被列為法定傳染病、還是被當成高傳染性的疾病來防治。於是，矛盾政策產生的「帶原」邏輯（也就是將感染者視為危險來源，隨時會把病傳染給別人）及其所引發的懼怕就這樣運作於日常生活中，而所有掛在嘴邊的關懷和尊重，也就在愛滋成為社會版新聞賣點時立刻破功。

在後雞尾酒療法時期，我們面對的是種種建構愛滋現實的場域。醫療科技的快速進展和干預、跨國藥廠的持續壟斷、社會規訓技術的組裝、新式管理的研發、全球防治政策的更迭、愛滋 NGO 與運動的跨國連線，以及愛滋人權論述的擴散等等——這些要素各有其自身動力，在因緣際會下碰撞而造就了不同的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而在特定環節與地緣下所產生的異質矛盾社會力與公權力在愛滋議題上的匯流、競逐，更是深深地形構了在地感染者的肉身、經驗與社會處境。在確切的歷史脈絡中，愛滋文化研究探問的是敘事再現、知識實踐、權力宰制關係以及情感運作如何刻畫了愛滋污名，並從中發掘抵禦的可能性。

自 1980 年代中期台灣和愛滋相遇以來，公衛的醫療道德就主宰了愛滋的話語權與本地的愛滋防治政策。威權體制下的禁慾式恫嚇宣導，與當局將感染者持續罪犯化的列管，使得愛滋成為最被污名的疾病。抗愛滋病毒療法在 1997 年引入台灣，固然大幅延長了感染者的生命週期，但在今日愛滋全面醫療化的狀態下，卻也弔詭地使得在台灣一向難以被公共化的愛滋議題更被侷限於醫病與諮商關係之中，而愈形私密化。另一方面，隨著感染人口的持續增長，本地愛滋服務產業也在 21 世紀初浮現，成為當下愛滋人口治理之重要環節。由於本地深植的愛滋污名結構狀態，為感染者代言、倡權的民間愛滋團體一方面是與官方抗爭與折衝的行動者，但同時也因服務感染者而站上管理者的位置。而隨著行政院跨部會「愛滋病防治推動委員會」在本世紀初的成立以及民間愛滋服務產業的興起，過往國家單向主導的防治政策也逐漸演變為一種官、民合作的愛滋治理。在此狀況下所開展的愛滋防治主流化趨勢中，儘管關懷愛滋的溫情與「去愛滋污名」的呼聲表面上似乎取代了上個世紀末恐懼愛滋的防治氛圍，但從近年幾樁事件所引發的社會愛滋恐慌來看（例如 2004 年的農安街轟趴事件以及 2011 年的台大器捐案），愛滋污名依然在公衛理性與人道關懷裡持續加深。



本書脫胎於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在 2012 年 6 月 10 日舉辦的「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學術研討會。我們請到國際執牛耳的愛滋文化研究學者 Cindy Patton 擔任會議主題演講，我也搭配發表論文。秉持性／別研究室一貫的學術與運動對話的傳統，會議也邀請了呂昶賢、張正學、喀飛以及徐森杰這四位重要的本地愛滋行動者做為回應人與論壇引言人。會議更因多位本地早期的愛滋運動者與會而深具歷史意義。除了這場會議的論文與紀實外，本書也收錄了筆者的〈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 NGO 防治文化與性治理〉（發表於 2011 年的「第三屆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學術會議」）以及論文發表時的現場討論記錄，以豐富愛滋文化批判的幅員。另外，為了讓讀者一覽本地愛滋地景的變遷，我們在本書後面附錄也編製了一個具有運動觀點的台灣愛滋大事記，並附上影響本地愛滋政策甚鉅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的歷次修法條文，方便讀者在閱讀時參照。做為本地第一本愛滋文化研究專書，《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企圖對全球愛滋佈局提出在地運動的批判與思考。而有鑑於紅絲帶已然成為愛滋主流化下的新圖騰，本書封面刻意以沾了血漬的紅絲帶別針為意象，旨在戳破當下人道關懷氛圍裡操作的愛滋治理，以挑戰醫療威權下的種種權力運作與性／別壓迫。

在編排上，本書以 1996 年雞尾酒療法問世做為分界，前兩章處理的是台灣的愛滋結社（黃道明）與北美的愛滋運動（Patton），而後兩章聚焦的則是「後雞尾酒療法」時期的台灣愛滋防治主流化（黃道明）以及「治療作為預防」的全球新趨勢（Patton）。這兩個部



分皆由筆者開場，主要目的是先為本地讀者提供一個同時期的在地歷史閱讀脈絡，以便參照 Patton 所處理的西方與全球脈絡，而這樣的安排同時也有引介 Patton 重要著述與導引愛滋文化研究方法的作用。讀者可把兩位作者的論文各自串起來，在縱向的時間軸上參照兩位如何透過歷史的回溯來處理當下愛滋所面對的迫切問題。

從作者的軸線來看，從早期愛滋結社到近期愛滋產業興起，黃道明刻畫了民間團體的位移以及治理模式的流變，顯示愛滋做為法定傳染病的種種法律、政策、與社會技術操作，如何生產了感染者的身體需要被「處置」的制度性愛滋歧視，以及訴諸醫療威權的國家道德主權如何搭配民間團體所中介的篩檢文化，造就了今日表面上有愛滋人權法律保障卻日趨嚴峻的本地愛滋規訓。面對官、民共治下出現的新好同志健康文化以自清「去污名」的策略，黃道明探究早期感染者如韓森與田啟元如何在深刻污名的情境下以匿名操作的方式打開了一個衝撞列管體制的政治空間，而在召喚這種抗爭精神時，黃道明也強調身分認同政治必須持續詰問制約現身的新常規運作。另一方面，Patton 兩篇論文裡的一個共同批判對象則是「治療作為預防」（今年7月甫在華盛頓舉行的世界愛滋病大會的火紅主題）。她論證這種由流行病學主導的新治理模式如何架空了社群抗爭歷史脈絡中形成的權利論述，又如何以威權的方式強迫個體接受治療以降低總人口的病毒量，而完全忽視了罹病的主體感受及其多層結構壓迫下所面對的社會處境。Patton 因此重探加拿大愛滋運動者 John Greyson 的影像美學，點出其挑戰白人種族優勢的男同志色慾再現，以及性愉悅的創發如何造就了具有基進意義的「安全性教育」實踐，並藉由早期愛滋運動中



那種積極改造「性健康」既有定義而轉化壓迫結構的酷兒政略，來回應當前治療掛帥的愛滋防治所蘊涵的人口治理政策。呂昶賢對這個發展的回應則探究了「治療作為預防」在本地脈絡的意義，即現行免費但強制的愛滋治療如何成為國家挾持、控管感染者的本地特殊狀況。在當局強勢推行的篩檢政策下（亦即透過匿名與強制手段找出／抓出感染者，進而將之列管、治療），「治療作為預防」在本地作用的後續發展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本次會議的行動論壇與論文發表都伴隨了熱烈的問題討論，引發了相當深刻的在地對話以及專業省思，特別值得讀者仔細品嚐。我們非常期待此番公共言說能夠在本地的愛滋運動中繼續發酵，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引介讀者思索愛滋政治的利害關係與權力效應，看到行動的歷史條件和可能。這本書對本地愛滋脈絡的介入是個開端，日後我們將發展更豐厚的批判論述，從邊地發聲，以解放政治的視野來迎接受滋新局勢帶來的挑戰。

鳴謝：

在此要感謝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的補助，讓「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學術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而本書的出版則要感謝台聯大系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除了向性／別團隊辛勞的助理蔡孟珊、沈慧婷、宋柏霖、彭詔絜致謝外，我也要感謝丁乃非和何春蕤，她們在會議現場的專業口譯讓對話得以流暢進行。何春蕤在譯稿校稿與謄稿中付出許多心力，在此特別致謝。

